

《惜抱轩书录》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比较

徐雁平

“四库”系列研究已成专门之学,相关研究论著数量众多,仅林庆彰主编的《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(1900—1993)》就收录九百八十四种,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有论著二百六十八种,在此二百六十八种论著中,又有二十七种牵涉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纂修研究,其中以沈津、潘继安、罗琳三位学者的论文最有份量^①;近有司马朝军专著《四库全书总目研究》,其中第一章为“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编纂考略”,占篇幅一百余面,多有结实之见解。本文以姚鼐《惜抱轩书录》为例,将其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对应提要作较全面的比较,在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明晰“分纂提要”与“总目提要”之异同,其意一方面在了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编纂的具体过程;另一方面,在证示“提要”作为一种应用文字,有其“体制”上的独特性。

《惜抱轩书录》的版本情况,据南京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,有三种版本,其一为道光十二年刻本,有毛岳生、李兆洛序;其二为光绪五年桐城徐宗亮《惜抱轩遗书三种》刻本,在毛、李序外,又有徐宗亮序;其三为师石山房钞本,底本为光绪五年刻本,以眉批的方式校正该刻本讹漏三十二处。姚鼐所作提要未收入文集中,李兆洛以为原因是“当以各书所编订,业见采于《总目》。”^②提要共八十八篇,“经录”十二篇,“史录”十八篇,“子录”二十四篇,“集录”三十四篇。提要总数,姚门弟子毛岳生在序中所言为八十八篇,然据该书目录统计只有八十六篇,差数出在“史录”,标明十六篇,经列表统计,证明目录有误。查考比较,道光十二年刻本目录标明“史录十八首”,知错误自光绪五年刻本始。此点罗琳一文正确,而司马朝军专著中有小误。出现这种差异,似是版本选择造成^③。姚鼐的“分纂提要”与“总目提要”的关系,经比较与统计,有以下结论:一、姚氏八十八

①沈津:《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21辑;潘继安:《翁方纲四库提要稿述略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25辑;罗琳:《四库全书的分纂提要、原本提要、总目提要之间的差异》,《古籍整理与研究》第6期(1991年6月)。

②见《惜抱轩书录》卷首,光绪五年刻本。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史梅老师为笔者阅读《惜抱轩书录》帮助颇大,在此谨申谢忱。

篇提要,未收入《总目》中有五篇,比例为 5.6%;二、与姚氏原稿比,篇幅变化程度在三分之一以下的提要有三十五篇,占采用提要(八十三篇)的比例是 42.2%,其中未有明显变化者有十二篇,比例是 14.4%;三、与姚氏原稿比,篇幅变化在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间者,有十三篇,比例是 15.6%;四、与姚氏原稿比,篇幅变化在三分之二以上者有三十五篇,比例是 42.2%,其中几乎全改或未用原稿者有十一篇,比例是 13.2%。造成姚氏“分纂提要”篇幅变化的主要方式是对姚氏原稿的增改,增与改有时同时进行,分开而言,以增为主的提要有五十二篇,以改为主的提要有三十一篇。司马朝军对《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》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比较研究结果是:《总目》未见著录者有一百四十八篇,约占 12.87%,相同类四十二篇,约占 3.65%,总体上看,翁氏提要有一半以上与《总目》不同,接近一半提要稿经过不同程度的修改润色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编纂大致经过分纂官起草、总纂官修订、总裁官裁正、清高宗钦定四个步骤^②,从姚氏、翁氏所撰各篇提要篇幅变化的幅度和相关比例来看,《总目》编纂过程比较复杂,工作量相当大。针对姚氏而言,论者往往将其提要稿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原因归结于汉宋之争,梁启超也说过四库馆是汉学家的大本营,姚鼐身在营中,自然不能排除学术上的争论,从而导致提要的改动;但将姚氏“分纂提要”与《总目》比较,真正明显牵涉汉宋之争的提要不过四篇,即使将暗含汉宋之争的提要纳入,其数量也是很有限的。故姚氏“分纂提要”被增改的原因并非全由汉宋之争而起,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提要的“体制”。毛岳生于《惜抱轩书录序》中已言及此事:

纂修者益事繁杂,诋訕宋元来诸儒讲述极库隘谬盭,可尽废。先生颇与辨白,世虽异同,亦终无以屈先生。文达特时损益其所上序论,令与他篇体制类焉。^③

以姚鼐“分纂提要”与“总目提要”比较分析之所得,推测翁方纲提要稿的被增改,其原因或许亦在提要之“体制”。目录学之要旨在于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,欲达此目的,除在部类结构方面见工夫外,提要之撰写亦是要事。姚名达总结刘向等写叙录之义例,包括八方面:其一,著录书名与篇目;其二,叙述讎校之原委;其三,介绍著者之生平与思想;其四,说明书名之含义,著书之原委及书之性质;其五,辨别书之真伪;其六,评论思想或史事之是非;其七,叙述学术源流;其八,判定书之价值^④。这八个方面正是构成提要“体制”的要素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此八要素皆能继承发扬,只是在具体提要中要素之包涵有详略之分而已。姚氏“分纂提要”被增改的原因,持此八要素衡量,便能找到一种平允的解释。先举一文字不多但有代表性的提要作一分析。

①司马朝军:《四库全书总目研究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4年版,第15页。

②同①,第4-45页。

③毛岳生:《惜抱轩书录序》,见《惜抱轩书录》卷首。

④姚名达:《中国目录学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版,第33-37页。

《剧谈录》

《剧谈录》，康骈所撰。骈字驾言，唐僖宗乾符中登进士第。《录》中皆记唐时故事，于文宗以后世事尤多。《新唐书》颇采其语，《通考》载是书三卷，今本祇载二卷。刻本篇首书骈为宋人者，误也。其中有云：今则睹淳耀之烈，启中兴之期，亿兆人心复归于唐德。是书之成，其在中和元年复京师以后，昭宗迁洛之前乎。淳耀之烈，语本《国语》及于宝《晋纪总论》，刻本讹为淳辉之烈，亦非也。^①

《剧谈录》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

唐康骈撰。王定保《摭言》作唐骈，盖传写之讹。《唐书艺文志》作康骈，以其字驾言证之，二字义皆合，未详孰是。诸书引之，皆作骈，疑本《唐志》，误也。骈，池阳人，乾符四年登进士第，官至崇文馆校书郎。是书成于乾宁二年，皆记天宝以来琐事，亦间以议论附之，凡四十条。今以《太平广记》勘之，一一相合。非当时全部收入，即后人从《广记》钞合也。此本末有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字，盖犹影钞宋本。如潘将军一条，注中疑为潘鹞碑字，今本《剑侠传》从《广记》剽掇，此条讹为潘鹤碎，遂不可解。知此本为善矣。其中载元微之年老擢第，执谒李贺一条，《古夫于亭杂录》辨之曰：案元擢第，既非迟暮，于贺亦称前辈，诟容执贄造门，反遭轻薄，小说之不根如此。其论最当。然稗官所述，半出传闻，真伪互陈，其风自古，未可全以为据，亦未可全以为诬。在读者考证其得失耳，不以是废此一家也。^②

将两篇提要作一比较，高下不难判别。“总目提要”只是对姚氏提要略有采用，其他内容全为增改。细言之，有数点差异值得注意：一、《总目》于书名下标明卷数，而姚氏在行文中介绍；二、《总目》在作者前标明时代，姚氏在行文中交代；三、《总目》考诸书中关于康骈记录之情况，有澄清疑误之意，又于作者生平叙说稍详。姚氏亦有一语考证，“刻本篇首书骈为宋人者，误也”，杂厕于文中，似应前移，不然有零乱之感；四、在论定成书年代和书之性质时，《总目》更为具体，其中“琐事”、“间以议论附之”，尤能表明此书之性质，与姚氏之“故事”略有分别，此或许是二家归类不同的原因之一。姚氏在推断成书年代所用之法亦有可取之处，然《总目》未用，而径以“乾宁二年”标示，此论断之背后当有考证；五、在判明书的内容时，《总目》所用之法灵活多样，有比勘、举例、引证，学术性较强，故结论坚实可信；而姚氏提要几无一语道及。在定版本之优劣时，《总目》以例证明刻本为善本，姚氏虽未明言，然“误也”“亦非也”则有明显的倾向性；六、最重要的是在断定书之价值方面，《总目》能从考证中出，对“稗官所述”此类著作有一公允之评判，能从“个别”上升到“类”的层面，尤能表现识见。姚氏于此阙焉。此

①《惜抱轩书录》卷二“史录”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二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版，第1210页。

外,姚鼐在介绍作者时,用“康骈所撰”,多一“所”字,以《总目》标准来衡量,亦有不简净之嫌。

《剧谈录》是一个案,以下将《惜抱轩书录》见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八十三篇提要被增被改的情况作一简要综述。

其一,姚氏“分纂提要”书名著录往往不准确,经、史、子三部出入稍小,集部变动最为明显,其用意似是在凸显作者而改书名。《陈拾遗集》著录为“陈子昂文集”,《张燕公集》著录为“张说之集”,《昆陵集》著录为“独孤及昆陵集”,《后山集》著录为“陈无己文集”,《淳南遗老集》著录为“金王若虚文集”,《秋涧集》著录为“王恽秋涧集”,《麟原文集》著录为“王礼文集”等等;也有省略书名者,如将《鄮峰真隐漫录》著录为“鄮峰漫录”,《北溪大全集》著录为“北溪集”等。

其二,卷数著录无定例。有直接标明者,如“《延平答问》二卷”、“《穆天子传》六卷”、“《上蔡语录》三卷”等;有在行文中介绍者,如《汉制考》、《西山群仙会真记》等;有未标明者,如《中庸辑略》、《冷斋夜话》、《芥隐笔记》等。

其三,作者著录无定例。姚鼐对著作作者不详者,缺而不言,而《总目》的做法,如《皇元圣武亲征录》、《靖难记》、《元典章前集》和《君臣相遇录》标明“不著撰人姓氏”,《十先生奥论》和《群公四六集》标明“不著编辑者名氏”,皆有定则。姚鼐对作者时代有先标明者,有不标明者,亦有在行文中交代者。如将《高峰文集》著录为“廖高峰集”,接下的文字是“廖刚,字用中,南剑州顺昌人,宋绍兴中为御史”,《鸿庆居士集》的著录也类似,这样的文字中隐含几个著录内容,然姚鼐皆未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格式显示。姚鼐关于作者著录不合《总目》标准的另一点,是往往在作者项中介绍作者之官衔,如《通鉴地理通释》《汉制考》均著录为“宋礼部尚书王应麟撰”,《颜鲁公集》著录为“唐太子师鲁国公颜真卿”,《唐书艺文志》载其集云……”,《鄮峰漫录》著录为“宋丞相史浩集也”等等。

其四,姚鼐在“分纂提要”中介绍作者生平,往往不能一贯到底。如《通鉴问疑》作者介绍及著述经过为:“刘羲仲撰,次其父恕与司马光答问之语”,而《总目》的文字更详细:

宋刘羲仲撰。羲仲,筠州人,秘书丞恕之长子。《宋史》附见恕传末,但称恕死后七年,《通鉴》成,追录其劳,官其子羲仲案《宋史》原本作羲仲,《癸辛杂识》亦作羲仲,均传写之误,今改正,为郊社斋郎,其始末则未详也。[略]羲仲此书即哀录恕与光往还论难之词。^①

《总目》在介绍刘羲仲时,相关信息比姚鼐提要多,其中尤为重要讲的是讲明刘氏传记的出处,并订正《宋史》、《癸辛杂识》中传写之误。《总目》在叙说刘氏生平时,似有强调家学传承之意味;而此点在《图绘宝鉴》中表现得更明显。姚鼐提要中仅以“元夏文彦所著”示之(又多用一“所”字),而《总目》则云:“元夏文彦撰。文彦字士良,其先吴兴人,居于松江。陶宗仪《辍耕录》曰:友人吴兴夏文彦,

^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八八,中华书局,1965年版,第752页。

号兰渚生,其家世藏名迹,罕有比者。朝夕玩索,心领神会,加以游于画艺,悟入厥趣,是故赏鉴品藻,百不失一。”^①这段文字引陶宗仪之语,以示夏文彦之学,其意在初步断定夏文彦著作之价值,其作用相当重要。又如《江湖小集》,姚鼐对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编者陈起只字不提,而《总目》有数语介绍,涉及成书背景。姚鼐有不少提要介绍作者生平,但并未一以贯之,譬如在介绍作者时,在《北溪大全集》、《陵阳集》、《秋涧集》、《剡源集》等六篇提要中也指出作者小传见于正史,但其笔墨未能推而广之,而《总目》在八十三篇提要中则有十七篇采用此法,其意在指示更为详尽的传记资料,可表明资料来源的可靠性,并能节省篇幅。

其五,姚鼐“分纂提要”亦留意一书在历代书目中著录之情况,但并未作为重要内容。如《难经本义》一书有语云“《汉艺文志》不载,始见于《隋书经籍志》,托名扁鹊,虽未可信,然其辞甚古,殆汉人所为也。”^②考诸家书目著录之情况,可见书籍之流传,亦可作为断定内容真伪之助证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于此处则着墨颇多,以《难经本义》为例,其文字有因袭姚鼐提要之处,然论断则有更进一步之妙。“《难经》八十一篇,《汉书艺文志》不载。《隋》《唐》‘志’始载《难经》二卷,秦越人著,吴太医令吕广尝注之,则其文当出三国前,广书今不传,未审即此本否。然唐张守节注《史记》‘扁鹊列传’所引《难经》,悉与今合,则今书犹古本也。”^③在《总目》中收录的姚鼐所撰提要,被补充书目著录情况者,“经录”有六篇,“史录”有四篇,“子录”有四篇,“集录”有四篇,其中“经录”有五次引用朱彝尊《经义考》,其他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被徵引八次,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被徵引四次,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千顷堂书目》亦均被徵引。《总目》对《经义考》的重视,在于“上下二千年间,元元本本,使传经原委,一一可稽,亦可以云详赡矣。”^④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其用在“古书之不传于今者,得藉是以求其崖略;其传于今者,得藉是以辨其真伪,核其异同,亦考证之所必资,不可废也。”^⑤书目著录情况的增加,使《总目》提要具备考证品质,学术性也因而增强。

其六,姚鼐“分纂提要”在揭示学术源流与刊刻经过方面比较欠缺,这正是《总目》用力之处,此类提要至少有十六篇,其中以《中庸辑略》、《中庸指归》、《延平答问》、《甘水仙源录》、《毘陵集》等篇表现最为明显。如王恽《秋涧集》提要,姚鼐云王恽“自谓其学于元好问”^⑥,而《总目》则展开述之,以见其特色。“恽文章源出元好问,故其波澜意度,皆不失前人矩矱。诗篇笔力坚浑,亦能嗣响其师。”^⑦《延平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一二,第962页。

②《惜抱轩书录》卷三。

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〇三,第857页。

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八六,第732页。

⑤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八五,第730页。

⑥《惜抱轩书录》卷四。

⑦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六,第1433页。

答问》提要中,姚鼐亦述及程子之学的源流,但脉络不及《总目》清晰。《总目》《甘水仙源录》提要在介绍全真教之简况时,对姚鼐提要有所承袭,然又有更大的拓展,引相关书著作,以“示元兴之后,其教益盛。”

都卮《三余赘笔》曰:今之道家,有南北二宗。其南宗者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,以授汉钟离权。权授唐进士吕岩、辽进士刘操。操授宋张伯端,伯端授石泰,泰授薛道光,道光授白玉蟾,玉蟾授彭偃。其北宗者谓吕岩授金王嘉。嘉授七弟子,其一邱处机,次谭处端,次刘处元,次王处一,次郝大通,次马珏及珏之妻孙不二。此外又有所谓全真者,其名始嘉,盖嘉大定中抵宁海州,马珏夫妇筑庵事之,题曰全真。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,皆号全真道士云云。其说甚详,然孰见其授受乎?厥后三教归一之说,浸淫而及于儒者,明代讲学之家矜为秘密,实则嘉之绪余耳。^①

《总目》此段文字,牵涉道家二宗之谱系、全真教之小史,并论及全真教对明代讲学之影响,是真正的考镜学术源流。

其七,姚鼐“分纂提要”在对一书价值或一家学说的论断方面,与《总目》相比,用力不多或深度不够。《总目》至少在姚鼐二十四篇提要中加入此种“能出乎其外”的断语。《总目》的论断大致以两种方式表述,一是直接下断语,二是征引他人著作间接表达,或折衷前人论说出以己见。此两种方式,尤其是后一种方式,《总目》多用之,以增改姚鼐“分纂提要”从而扩充篇幅。姚鼐撰龚颐正《芥隐笔记》相当简略,亦无出色之处,《总目》在介绍作者及书名之后,论该书之价值:“颐正考证博洽,具有根柢,而舛谬处亦时有之,如韩愈‘马上谁家白面郎’诗误以为杜甫诗,《公羊传》孔父义彤于色误以为《左传》孔子语,王昌龄‘梦中唤作梨花雪’诗误以为王建。信乎考证之难。然统合全编,则精核者居多,要不在沈括《笔谈》、洪迈《随笔》之下,未可以卷帙多少为甲乙也。”^②论断公允,所举例证,有言必有据之感,而将龚氏书与沈、洪二家著作比较,亦有在“类”中判定之意。邓椿《画继》一书提要,《总目》篇幅较姚氏提要大增,除分述各卷内容大要外,《总目》有断语云:“椿以当代之人,记当代之艺,又颇议郭若虚之遗漏,故所收未免稍宽。然网罗赅备,俾后来得以考核。其持论以高雅为宗,不满徽宗之尚法度,亦不满石恪等之放佚,亦为平允,固赏鉴家据为左验者矣。”^③在姚鼐八十三篇提要中,《总目》徵引他人著作来作判断的提要有十八篇之多。如独孤及《昆陵集》提要,姚鼐论及独孤及文章在唐代之地位,然用语不多,而《总目》引权德舆、皇甫湜及王士禛之说,最后出以己见,以为王士禛所说“是未尚论其世也。”^④下面以戴表元(字帅初)《剡源集》提要作一比较: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七,第1262页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一八,第1021页。

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一二,第960页。

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五〇,第1285页。

《元史》本传称其文清深雅洁,至元大德间,东南文章大家,惟表元一人。盖宋末诗文体益陋,表元尚能以雅正自持,其后宋濂尤爱之,故作史诗推崇如此,然亦过矣。^①

表元少从王应麟、舒岳祥游,学问渊源,具有授受。顾嗣立《元诗选》小传称,宋季文章气萎薶,而词骯骯,帅初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。其学博而肆,其文清深雅洁,化朽腐为神奇。间事摹画,而隅角不露。尤自秘重,不妄许与。至元大德间,东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,帅初一人而已。又引宋濂之言曰:濂尝学文于黄文献公,公于宋季词章之士乐道之而不已者,惟剡原戴先生为然云云。于元人之中,推之独至。今观其诗文,信嗣立所论不诬也。^②姚氏提要之大意,已纳入《总目》;然《总目》又示戴表元学问渊源,引顾嗣立文字,明其文章特色,又通过宋濂之语,以见戴氏文章源流;最后可见姚鼐与《总目》结论略有不同。此类断语,对于读者而言,便于把握一书之价值,故尤为重要;而所徵引诸家著作,亦为进一步查考研究提供一些线索。

其八,《总目》提要改变姚鼐“分纂提要”篇幅和学术层次的另一手法是考证。考证涉及各个著录项目,而考证的展开必须有一定的篇幅,此类包涵考证的提要要有十五篇。唐释彦棕《后画录》,姚鼐提要以三行文字平平述之,而《总目》则在姚鼐提要之后,补以考证:“然末一人为广陵郡仓曹参军李湊。考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,李湊,林甫之侄也,初为广陵仓曹,天宝中贬明州象山尉,尤工绮罗人物,为时惊绝。则湊为明皇时人。彦棕远在太宗之世,何以能预录之乎。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曰:僧棕之评,最为谬误,传写又复脱错,殊不足看也。是真本尚不足重,无论伪本矣。”^③此种考证,已改变读者对一书价值的看法。姚鼐撰提要,亦用考证^④,然非着意为之。如前引《剧谈录》即是一例,而《岁华纪丽》中的考证,可见两家功夫高下之分。

姚鼐“分纂提要”与“总目提要”在汉宋之争表现得较为明显的有《四书或问》、《通鉴地理通释》、《伊洛渊源录》、《淳南遗老集》等数篇提要,然其篇什有限,并不是姚氏“分纂提要”被增改的主要原因,故在此不展开述说。此外,两家在图书归类方面亦有出入,姚鼐将《穆天子传》《山海经》归入史部,《总目》则列入“子部小说家类”;姚鼐将《伊洛渊源录》归入子部,《总目》列入“史部传记

①《惜抱轩书录》卷四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六,第1424页。

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一四,第972页。

④翁方纲《翁氏家事略记》云:“自癸巳春入院修书,……每日清晨入院,……午后归寓,以是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处,在宝善亭与同修程鱼门、姚姬川、任幼植诸人对案详举所知,各开应考证之书目,是午携至琉璃厂书肆访查之。……每日检有应用者,辄载满车以归。”(转引自潘继安:《翁方纲〈四库提要稿〉述略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3年第1辑,第215页)可见校阅群书到写提要过程中,考证似是不可避免之事。

书讯:清末民初宪政史料丛刊(全十一册)

定价:4700 元;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出版

清末民初宪政运动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多彩的一页,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部分。前后数十年间,我国的宪政之路经历了异常艰难曲折的过程,近几年颇受学术界的重视。本刊所选史料计 60 余种,均系国家图书馆珍藏,多为当时的宪政编查馆、预备立宪会和筹备国会事物局等机构编辑,是研究清末民初宪政历史的第一手资料。

《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——集部·明代卷》

精装 16 开,全十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 8 月出版。

本书收录了包括《明文海》、《明诗综》、《文宪集》、《东里全集》、《忠肃集》、《沧溟集》、《白谷集》等明人诗文总集、别集一百五十余种,全部辑自文津阁本四库全书,为同书之文渊阁本所未收。其体例涉及明人奏疏、尺牋、游记、诗词、方志、墓志、题咏等各方面,内容不乏序跋、年谱、传记、边事、遗闻轶事,对于研究明代的历史、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。

类”;姚鼐将《商文毅公疏稿略》归入集部,《总目》列入“史部诏令奏议类”,两家学术文章之见解有不同,此点罗琳已有论述,故亦略而不论。总之,姚鼐“分纂提要”被增改的主要原因乃在于不合提要之“体制”,离“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”的要求较远,姚鼐未将其收入集中,或许亦有遮掩之意。据司马朝军《四库全书总目研究》,目前所能见到的“分纂提要”稿,在姚鼐之外,另有翁方纲、邵晋涵、余集等数家,倘能将诸家“分纂提要”与“总目提要”,作一整体性比较研究,当能看出“分纂提要”被增被改的原因,所得之结果当比以姚鼐个案研究所列出的八点更为全面清晰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